

全球化史学

——我的史学三境界

中国版

杜玉亭◎著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消灭了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新生了两大社会角色，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而带来了世界性巨变。其中首要的巨变，是开拓了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随之而生的是军事全球化，它们是由作为发展动力的资产阶级工业技术革命创造出来的；而政治全球化理论以1848年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为代表，史学全球化理论以恩格斯1891年问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它们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反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全球化史观的基点。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我的史学三境界

全球化史学

中国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史学中国版：我的史学三境界 / 杜玉亭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482 - 1290 - 4

I. ①全… II. ①杜…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113 号

全球化史学中国版

——我的史学三境界

杜玉亭 著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冯 峨

封面设计：夏雪梅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320 千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1290 - 4

定 价：40.00 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1071 5033244

E - mail: market@ynup.com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消灭了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新生了两大社会角色，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而带来了世界性巨变。其中首要的巨变，是开拓了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随之而生的是军事全球化，它们是由作为发展动力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而政治全球化理论以1848年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为代表，史学全球化理论以恩格斯1881年问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它们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反对派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全球化史观的基点。

《全球化史学中国版》序

林超民

读杜玉亭老师的《全球化史学中国版——我的史学三境界》，不禁想起王国维当年在《国学丛刊序》中的一段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与无用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与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又曰：“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玉亭师是从中西之辩、古今之议、新旧之争中，披荆斩棘，奋力前行，独辟蹊径，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的学术巨匠。他用数十年的实践，在古今、中西、新旧之间互相借鉴、“互相推助”、互相贯通，为我们树立了把“全球化史学”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玉亭师所说的“全球化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当玉亭师跨进云南大学开始系统研修历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是独尊的理论、必修的功课、立身的基石。为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与实际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立足的基点、观察的视点、办事的支点。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无论古今中外，只要做学问、只要看问题、只要办事情，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无论世界上的理论如何多元化，方法如何多样化，“实事求是”是大家必须严守不逾的不二法门。我想这就是王国维所谓学无新旧、学无中西的缘由，学问是相通的，都必须实事求是。玉亭师治学半个多世纪，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一往无前追求的就是用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史学问题，他始终坚持不渝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出神入

化的自由境界。正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不偏离，不苟且，不疏忽，不随意，才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业绩，为后学做出了示范。

玉亭师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认真研究、融会贯通、踏实践履、求是创新四个阶段。在大学、在书斋、在田野、在社科院，玉亭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理论，对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与《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既深入又扎实。他不是拘泥于哲学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总体意蕴和基本精神的创新者。他既注意文本的细节，但又不迷失于文本的末节，而是抓住文本的关节，融会贯通，高屋建瓴，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实践。玉亭师不是为理论学习理论，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他是为着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历史问题学习研究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和民族研究的实践之中。他不仅认真阅读历史文献，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而且到田野做深入细致、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扎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玉亭师对云南省的省情、中国的国情有了超越书本、超越他人的真知灼见。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他在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中，既注意对过往人事的科学把握，又注意创造未来的高瞻远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书斋与田野的结合、过去与未来的结合，造就了玉亭师在中国民族学与历史学上成就斐然、卓然大家的地位与声望。

五十多年来，玉亭师在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的成就斐然，荦荦大者有：对马克思主义“五形态社会进化论”用中国社会实践加以验证，否定欧洲农奴制的普遍性，提供中国古代社会标志性经典形态；指出“野蛮人不懂爱情”的经典论断的谬误；在否定“五形态论”模式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历史既非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单线论，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多线论，而是标志性经典形态表现的规律性与千变万化的多样变异性的对立统一中的自然演进。他总结出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立体多元差异”和“市场律差”特点，为科学认识云南省省情，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他深入调查研究，锲而不舍，历尽二十多年艰辛撰写的《基诺人民族识别报告》，为1979年国务院确定基诺族为单一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首次为云南蒙古族撰写史书，为基诺族撰写第一本史记；在彝族史研究中提出诸多创见；他在云南民族史研究中发前人所未发。

未发，言前人所未言，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中泰关系史上的研究成果，对于阐释国家历史、纠正西方谬误、推进中外了解、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的人才，我是他的学生，是读他的书、学他的榜样成长起来的。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涌现出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民族史学家王文光、社会学家乔亨瑞等，无不是一时之选，均为当今云南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我到基诺山做田野研究时，基诺族的老人和领导对我说：“我们最感激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他帮我们从土司统治下解放出来，一步跨进社会主义；一个是华主席，他当主席和总理的时候批准我们基诺族成为一个单一民族；还有一个就是杜玉亭老师，是他二十多年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为我们基诺族撰写识别报告、书写了第一本历史。”这些话是发自忠厚、淳朴、诚实的基诺人内心的肺腑之言。

自从1958年上基诺山研究基诺人以来，玉亭师除特殊年代外，都要上基诺山做田野研究，四五十年从未间断。田野调查研究是考察、探索人文现象及本质的基本方法之一，因为要了解别人（他者）的文化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如果不是长时间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就不能看到真实的景象，就不能透过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禁忌避讳，看到其社会结构、制度渊源、思想意识、信仰崇拜等。只有在年复一年地与研究对象朝夕相处，甘苦与共，你才会赢得他们的信任，你才能对他们的文化有真正的理解、对他们的思想有透彻的认识。辛卯元旦前十几天，玉亭师将本书的书稿交给我后，便到基诺山去了，在基诺山迎接农历正旦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不完全是作为学者到基诺山做研究，同时就像回到自己亲人的家园。基诺山的乡亲们欢迎他，不仅是把他看做一个外来的学者、人类学家，同时还把他看做自己的同胞。当今还有谁能比得上玉亭师这样一位和当地民众融为一体的学者，拥有和他一样的学术家园？正因为如此，玉亭师才能够一年又一年向学术界、向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新知、新见、新意。不止一位台湾的学者、国外的学者对我说，玉亭师就是“当今的摩尔根”。我想摩尔根长期在印第安人中生活，写出《古代社会》这样不朽的经典名著，成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先导，的确是民族史上的高标。玉亭师则在运用、反思并超越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中西合璧，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史学考据、民族考古于一体，达到了全球化理论的新高度。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历史民族学）异军突起，方兴未艾，讲到历史

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发端于20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其实，玉亭师学术研究既有历史学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取向，又有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学取向；既有政治史取向，又有社会史取向；既有历史精英的传奇篇章，又有普通大众的生活纪实；既有典藏文献的整理、考证、诠释，又有民间口头传说的收集、鉴别、叙事；既有忽必烈、兀良合台等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业，又有铜鼓、基诺地名这样的细微考察。这就是今天大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玉亭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样的研究。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当然，玉亭师的论著并非尽善尽美，也非白璧无瑕，其立论或有可商榷之处，其宏观视野的探讨余地还相当多，但是玉亭师对理论的深入钻研，对文献的广泛披览，对史料的详细占有，对田野的一往情深，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全球化史学中国版》是玉亭师的新著，它历经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终于锤炼成书，堪称史学领域的创新名作。而其副标题，是“我的史学三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学理论的“复制”，“用中国的具体实例丰富了权威理论”；第二个境界是西学中用的“和而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学理论的质疑、挑战；第三个境界是“和合出新”，用中国的文献研究、田野调研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学理论的丰富与出新。

掩卷深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涌上心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玉亭师史学研究的三境界，不就是王国维所说，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的三境界吗？

此种境界非大学问家不能道！

年逾古稀的玉亭师，蓦然回首，“一览众山小”。

玉亭师索序于我，师命难违，勉为其难，草成是稿，不是序言，而是续貂的狗尾。

我与全球化史学（自序）

说到全球化史学，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1935—2010年，我出生至今的7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反右派”、“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社会建设，其间社会变迁之巨大，之频繁，之曲折，之影响深远，可谓史无先例。此时的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自不会有什么世外桃源。说到这里，不禁想到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一句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其学成之道的这一概括，言简意赅，富有哲理，而于有志者的启迪尤深。我曾反复琢磨这一名句，在似有所悟时也曾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亦有某些相近之处，但三思以后，总感双方的时空环境迥异，难以比较，终生南辕北辙之念。窃想，“十有五”时的1950年春节，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的我正驻军四川璧山县城，突遭残敌围攻，情势危急，赖于李德生师长（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今健在）指挥退敌，方转危为安；身处此等非常环境，怎么有“志于学”的可能呢？“而立”岁的1965年春节，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民研所”）助理研究员的我，正在贵州省晴隆县鸡场区三宝公社搞“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之后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此地是贵州知名的大山区，居民以彝族、苗族为主，其山村干部本是1949年以后培养的贫下中农，但在当时“重新解放”的指令下，我等“四清工作队员”犹如进入了敌占区，要重新“扎根串联”；贵州“四清”一结束，我又被派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左旗搞“四清”；在此“阶级斗争”不断延伸的年代，又何以谈得上“三十而立”？我的“不惑”岁在1975年，因“文革”浩劫酿成的悲剧使我在昆明的家属难以自存，只得离开履职18年的中科院民研所；此时的国家形势也不比我家的困境好多少，故离京前曾

向在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时相识的老乡任继愈先生（原中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求教，他对我个人的未来多有勉慰，却未指出我关心的“国是”的迷津，可知笔者40岁时还与孔子的“不惑”无缘。1985年我“天命”岁，已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三年，一直由我一人主持全院工作，只好日夜投入，在科研、地方特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诸方面颇有建树，但却不谙人事，是年末突发访问法国的“政治问题”，经许多莫名的磨难后终至次年9月被免职，足见50岁的我依然不知“天命”。“耳顺”岁后，对时下商潮中某些似是而非的“学术”鼓噪颇不顺耳，忍不住写一点随心文章，故60岁的我仍难以称得上“耳顺”。如今年过70，时光的积累增广了见识，学术上渐有精进，需要研习的命题亦多，谁知又戴上冠心病的帽子，孔子的“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与我又将难以和谐。总之，纵观我的人生学路关节，恰与孔子相左，但这正反映了2500年间的时势差异。孔子作为“百家争鸣”的一家历经坎坷周游列国，因其主张不为争霸的诸侯所用，就退而授徒讲道，遂成就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而1840年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列强的炮舰打开，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就变得“家不家国不国”了。我1至10岁的1935至1945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家乡山东茌平县属于中共游击武装抗日的日军占领区，1939年底父亲被捕，继之祖父又被捕，几天后他们父子同时被日伪军活埋于一个土坑内，此时我只有4岁。朦胧记得但终生难忘的一个场景是：在博平县城东何庄外祖父家寄居时，我与抱着弟弟的母亲跟着一群人在田间奔跑，突然被日军包围，只见骑在马上日军挥刀嚎叫，人群中有人在日军的枪声中倒下，我只有扑在地上听天由命；此可谓我求生也难的童年时代。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在美国支持下，以强势军力进攻中共解放区，国共两军的内战爆发，因为日军占领时被习称为“二鬼子”的降日“伪军”又归入国民党军，其中有的人对同胞之残害形同“日本鬼子”，因此，我便萌生了改变“家不家国不国”面貌的意念，遂于1947年底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年不满13周岁）；但就个人而言，这仍可以说是为了求生存。直至1954年考入云南大学，我才进入了求发展的时期。

以上人生学路的古今对比与我童年、少年境遇的述略，虽是个例，但全球化军事霸权的阴影却令人难忘。此后进入大学，接受的核心学理就是“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以下简称“五形态论”），它就是特定时代的全

球化史学理论。

我 1954 年大一的首要“政治课”，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钦定”，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授课老师谓之“当代马列经典”，以下简称《联共史》），其中的“五形态论”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加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便构成了我治史的学理取向。这在本书第一编另有详细论述。当时流行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社会发展简史》，就是这一理论的普及性简明读本。“五形态论”的特点，是将人类历史排列在一个单一轨道，依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逐一演进，且后者取代前者被认定为客观规律。由此可见，“五形态论”是一种涵盖全球的宏观史学，它以单线进化立论，纵向上可以包罗人类的发展历史，横向上囊括了现实乃至未来世界，为传统史学之前所未有，故它对于历史学子的我，当时就有一种全球化史学的印象。这也是冷战时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存在。“全球化”一词是 1985 年美国经济学家 T. 莱维首先提出的，很快就为世人接受，正说明它是久已存在的社会现象。

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五形态论”更是一种权威理论，因为它的理论归宿是：社会主义阵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是历史的规律。它因此又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存在的理论依据。这种现实存在的全球化史学，在当时的本人看来，既契合中国的实际，也契合世界的实际。如 1958 年我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全国“大炼钢铁”，其目的就是在生产力的关键性钢铁指标上“大跃进”——“超英赶美”；而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跃进”是建立人民公社，其著名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顿时发生了地覆天翻式巨变。50 多年后的今天再回识，既可以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前付出的一大笔学费，也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抗争的一种“战术”，亦即冷战时代全球化经济与政治的 1958 年中国版。即使此时笔者参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以下简称《简史》），本属学术研究，但因“五形态论”的主导，它又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一种较量，因而可谓之全球化史学中国版。本书以“全球化史学中国版”为名，就出于此。

上述 1958 年的中国“大跃进”与本人参编《简史》，都和横向世界的

两大阵营冷战密不可分，虽可以从经济、政治、史学的角度去观察，但它们终归全球化史学的横向特性。如果谈到“五形态论”的纵向特性，寻其根源，应是摩尔根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此书由发明发现、政治、家庭、财产四个部分建构，其中发明发现分蒙昧与野蛮两个时代，每一时代下再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且每一个阶段皆以具体的发明发现作为进化的标志。政治进化占据了该书的大量篇幅，尤其是它详细论证了作者在易洛魁人中发现的氏族制度，与在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一直通向古希腊、罗马的氏族、部落、民族、国家。家庭进化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母系家庭、父系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构成，特别是作者根据自己发现的亲属制度与家庭进化相结合，更增加了该命题的学术价值，但由此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财产观念的进化与人类的文明时代相连接，其大体进程是由古代不同时段的公有制逐渐演化到私有制，它还预期了古代的财产公有制在未来高级文明时代的再生。总之，《古代社会》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特别是他深入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发现，试图由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主题构建社会进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它出版不久就引起马克思的高度关注，视之为自己多年前发现的“唯物史观”的重新发现，故在研读中写了详细的“摘要”，准备另写一部著作，但终因去世而未果。恩格斯 1881 年出版的《起源》“序言”的头一句话，称其书是马克思“遗言的执行”，原因就在于此。此书的新贡献是，将人类社会进化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从全球化的角度对社会进化理论进行了再构建。但直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因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具备，“五形态论”便应运而生于《联共史》，并被尊为“客观规律”，《起源》则被尊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与这一历史过程相适应，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一系列全球化史学概念，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国家、奴隶制、农奴制、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母系制、父系制、一夫一妻制、公有制、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被引进了中国史学领域。不难发现，这应是西学全球化史学中国化的一种过程。

看来，社会进化论的命运颇具戏剧性。其奠基之作是《古代社会》，它出版后的第三年，作者摩尔根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这似乎是人们对其社会进化论启蒙性的一种奖赏。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是其“唯

物史观”的再现，结果就有作为其“遗言”的恩格斯的《起源》的出版，是为全球化史学理论的非凡成果。而社会进化论即全球化史学命运的拐点，在《联共史》的五形态论，因为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构成了两大阵营冷战意识形态的焦点，故双方对抗的时间长达 70 多年（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如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算起则有 40 多年）。但因 1991 年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苏联解体，就使得“五形态论”全盘失灵。接踵而来的就是“五形态论”被“抛弃说”的流行。的确，多年来它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彻底边缘化了。然而笔者认为，“抛弃说”也有些简单化，因为社会进化论百年变迁中的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今天看来，130 多年前问世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纷纭多样性的人文资源中试图构建人类社会进化的共性规律，颇似达尔文生物进化名著《物种起源》（1859 年）的姊妹篇，因此，对其全球化宏观历史的人文探索精神，应予以充分肯定。但限于历史条件，它不仅有许多疏误，更有模式化与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如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两大基本概念贯通全书，就是与其书中文明时代对应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标签。然而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尊重社会进化学理研究的客观过程，本书仍原文实说。《起源》的立论以《古代社会》为基础，故继承了前人的缺点，其长处是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全球化角度，将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进行了明确论述，成为享誉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化史学名著。《联共史》将前人的蒙昧、野蛮两个时代合称为原始社会，又从文明时代中划分出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四种社会形态，合为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这未尝不是全球化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家之言，但其问题在于发展了前人的模式化、简单化，尤其是高度政治化，使生动的学术理论变为僵化的教条，科学的灵性丧失殆尽，终以 1991 年的苏联解体而终结。因此，具体分析后就会发现，真正应当抛弃的是《联共史》“五形态论”的僵化教条，而不是《古代社会》与《起源》的全球化史学，即便“五形态论”的学术性也不宜抛弃，因为作为其立论基础的五种社会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特定时代权威理论的“五形态论”虽已失灵，但从学术的归宿上讲，它仍可属于社会进化论学派中的边缘化一派。上述对《古代社会》、《起源》、“五形态论”的具体分析与基本认识，就是我与“抛弃说”的不同点。正因为如此，无论是 1958 年还是 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本人皆以多民族中国丰富而独特的人文资源为依据，不断探索全球化史学的学理问题。本书的研究

结果就可以说明，为全球化史学立言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即使因苏联的解体而失灵，那也不过是其演进过程的一幕而已。这在本书“总论”中另有解说。

令人欣慰的是，1958年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以下简称“云南组”），参与《彝族简史》的调研与编写。彝族是云贵川三省人口与支系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且社会发展很不平衡，1949年前还存在农奴制、奴隶制与原始公社，与“五形态论”关系密切，不得不认真研究，这便是本书“全球化史学研究三境界编”的由来。还由于彝族历史悠久，文献记录颇多，史学中的问题也不少，这便是本书“传统史学的基础地位编”的由来。上述两编，皆由50年来发表的300万字著述中的近20万字的文例构成，且原文实录并注明出处，作为本书立论的基础；另设“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一题，对选录文例加以解说。因此，此作已非利用前人的资源著书立说，而具有了反映50年巨变的实证性特色，如今已难知的冷战时代的人文社会实况等，或是本书的金价值。本书副题“我的史学三境界”，概将书中的文例分为三境，以第三境界为上，意在对其学术价值作自我试评。殿后的“总论”概说全书，其核心理念在“我的全球化史观”。

2012年元月

目 录

《全球化史学中国版》序	林超民 (1)
我与全球化史学 (自序)	(1)

全球化史学研究三境界编

全球化史学主导下的学业	(3)
例一 “五形态论”即全球化史学研习期的时代特点	(3)
例二 历史规律是什么?	(8)
例三 基诺人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历史初探	(12)
例四 滇南纳楼土司农奴制	(22)
例五 试论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等级结构	(25)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35)

西学中用中的和而不同

例一 越过奴隶制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规律吗?	(38)
例二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	(48)
例三 《基诺族简史》的和而不同	(61)
例四 文明时代始于农奴制者比始于奴隶制者多	(63)
——云南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结论	(63)
例五 跨时代历史跳跃	(66)
——贵州民族历史发展特征	(66)
例六 立体多元差异	(73)
——多民族山区元江县实现小康的特点	(73)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86)
和合出新	(88)
例一 中国封建社会个性初论	(88)
例二 基诺族爱情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	(102)
例三 《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的全球化学理定位	(116)
例四 多民族云南社会形态的宏微通观 ——丰富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	(120)
例五 试论历史的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	(133)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139)

传统史学的基础地位编

史学考据	(145)
例一 《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目录》及其“问题考释·三”	(145)
例二 对《彝族的主要源流》的商榷	(151)
例三 傣族史称“百夷”始于何时	(167)
例四 兀良合台出师安南考	(169)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175)
民族考古	(177)
例一 彝族不是使用铜鼓的民族 ——兼对《秦汉以来铜鼓发现地区图》的商榷	(177)
例二 攸乐城遗址 ——清朝治理滇南边疆水平的自然坐标	(180)
例三 通海有关蒙古族石碑五通	(191)
例四 《云南蒙古族简史》佚闻	(198)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202)
传统与现代史学的链接	(204)
例一 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	(204)
例二 中国古代民族问题两大类型说	(217)
例三 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230)
诸例概说与史境分析	(241)

总 论

西学社会进化论的中国再进化	(245)
全球化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	(247)
我的全球化史观	(250)
附录 学在中西五十年	(257)
后 记	(269)